

我写的的所有作品加在一起，也不过是冰心的任何一本书比较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仅仅是个加入者，一个不太晚的文艺界普通一员而已。然而，我不后悔，因为我尽了交给的本职工作之外，还当了十年。宋代的史学家司马光写过一篇《游褒禅山记》，但是受了懒于前进的人的影响和火把的不够用，善于所至，只好游者尚不能十一。他在该文结尾时感慨万千地说：「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

陈浩望文集

● 陈浩望 著

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苏东坡《和子由渚池怀旧》诗曰：「人生到处知何事，应如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我编集出版《陈浩望文集》的目的也就是言泥鸿爪的意思。至于文章的好坏，艺术水平、理论水平的高低，如果像卖瓜的主梦那样自卖自夸是不好的，还是让读者诸君自己去评判吧。



陈浩望文集

陈浩望 著

國際炎黃文化出版社出版

陈浩望文集

作者 陈浩望

编审 傅天虹

出版 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社址 香港九龙中央邮局 73369 信箱

印刷 本社印刷厂

开本 710×1000 (mm) 1/16

印张 47.5

字数 780 千字

印数 1-500 册

2012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国际统一书号 ISBN978-962-8839-79-7

定价 人民币 88 元 港币 98 元



本书作者陈浩望，生于1939年农历3月18日，攸县柏市镇湖厂村人。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中共党员，中学高级教师。执教高中语文多年，并曾长时间兼任广播电视大学中国古典文学、古代汉语、中国现代文学史等课程的教职。调离教学岗位后，先后任攸县文化局副局长、攸县教育局副局长、攸县电视台台长等职。攸县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湖南省佛教文化研究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攸县作家协会顾问，攸县诗词协会顾问。（详见本书传记类《我的人生际遇》一文）（摄于2012年）



(左) 本书作者陈浩望 30
岁时摄 (1969 年)

(右) 陈浩望、陈素琴结
婚时摄 (1967 年)



▲ 1976 年,陈浩望、陈素琴夫妇在攸县二中教书时携儿女摄
于醴陵市



▲ 与表弟周显雄(左,本书序言作者)合影

全家合影 (摄于 2012 年春节)

前排左起: 陈浩望、孙女陈怀钰、妻陈素琴
后排左起: 次媳丁金媚、次子陈韶辉、长媳邓艺、
长子陈韶光、孙女陈怀珠、外孙唐志贤、女婿唐兰
君、女儿陈韶华



序

周显雄

2008 年的一个莺飞草长的日子，表兄陈浩望先生把他签名的诗文选集《春种秋收》送到我的手中。我浏览目录后，笑着说，您公开发表的作品有 200 万言，何不把所有的作品收集成册？长篇作品即使存个目录也行啊。表兄说，看以后的情况再说吧。不料，我这一句话，竟给自己找了件难事做。2011 年春，表兄对我说，他正在着手编辑较之《春种秋收》规模大一些的《陈浩望文集》，并向我索序。我说，我这个无名小卒给省作家协会会员的文集作序，怕不合适吧？表兄说，我想来想去还只有你最合适！我没办法再推辞了。然而，这个任务对我来说，确实是件大难事。因为，我还没真正写过序跋之类的文字，只是在攸县二中任校长时，为本校文学社创办的《金盆》创刊号写过一篇小小的前言。我哪有能力完成为《陈浩望文集》作序这个重大任务呢？但是这个任务又不得不去完成。理由之一，表兄是我学生时代的心中偶像。远在我念初中的时候，妈妈对我说，你表兄浩望是大学生，写得一手好文章。你要向他看齐呢。而今，我曾经的心中偶像要我做事，哪有不做的道理？理由之二，表兄是我工作时期的良师。我和表兄在攸县二中同事三年，在语文教学方面他给了我诸多指导。如果说，我的语文教学水平还算不错的话，表兄功不可没。现在，良师吩咐的事情，我怎么好意思推辞呢？理由之三，表兄还是我文学创作的指路人。他是我每一篇习作的第一读者，曾给我的习作提过不少宝贵的添改意见。如果没有他的指导，我的《陈长青》、《煤黑子和漂亮女人》等十来万字的文章就难以在好几种杂志发表并且获奖了。现在，表兄又给了我练笔的机会，我何乐而不为呢？

表兄年轻时是个帅哥。他中等身材，长着一双女人般的柔软的小手。五官匀称，胡须不多，浓密的头发极为听话地梳向右边，头顶左边的头发就自然形成了一条还算笔直的路。笑容总是挂在他四方的脸上。如果是站着与人交谈，他的两脚总会不屈不挠地成 40 公分跨开，两脚尖绝对固定在同一条线上的，谈着谈着，

不时会发出嘻嘻的笑声；如果是坐在沙发上与人交谈，两手大都是扶着沙发扶手的，当别人说到精彩处，他会突然朝自己的大腿上狠狠地拍上一掌：“是的。好，好！”随即又发出嘻嘻的笑声。他给我的印象很深刻，还有几点也是值得写写的。其一，喜欢提携家境贫寒的学子。据我所知，好几位科级干部乃至处级、厅级领导干部就都是在表兄的关爱下步入大学殿堂的。表兄的门生还有诸如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的著名世界历史学者刘新民等众多硕士、博士。1978年6月，我在攸县皇图岭公社中学高中毕业，那年高考我铩羽而归，做了半年的农民。在我深感体力活难做的时候，父亲写信给表兄，想让我插班攸县二中补习。该是1979年2月的一个深夜吧，时在攸县二中教学并担任行政职务的表兄忐忑不安地来到校长吴汉林先生的办公室，求他接受我这个落榜生复读，吴校长得知我的学习成绩比较好，只是前次高考临场发挥不够而落选，并看在表兄陈浩望的份上，便满口答应。我于是在1979年9月提了个还不算破旧的木箱，背了一床印花被窝，告别了我半生不熟的农活，踏上了新的路途。其二，忠诚于组织交给他的本职工作是表兄的人生铁律。在学生半工半读的年代，他担任班主任带领学生种试验田，为了多施一些肥，提高产量，学校厕所里的粪渣总是被他亲手掏得干干净净；收割的季节，他班上试验田产量排在第二。他到自己的试验田里转了一圈，然后向学生大手一挥：你们没做到颗粒归仓，赶快去捶杆（稻草）！不料，学生除了捶掉自己试验田稻草尖上的残留谷粒外，还把另一个班的稻草也给捶掉了。结果架起秤一称，他们班的试验田产量第一。另一班的班主任愤愤地说，陈浩望，你捶杆就捶你们45班的，为什么把我44班的杆也给捶掉了？真是岂有此理！表兄笑嘻嘻地说，这些学生真不听话……我参加教育工作时，表兄是有20年教龄的老教师了，可他真做到了精心备好每一堂课。有一次，他承担了上公开课的任务，我清楚地看到上公开课的那天清早，他躲在校园偏处油茶林中，以油茶树为学生，在那里试讲！不用说，那堂课是非常成功的。其三，博览群书，教学上有一种居高临下的优势。他讲课的特点是“形散而神不散”，信手拈来的事例、掌故，往往引发学生会心的微笑，学生真的在轻松愉快中接受了知识，提高了能力。听他的课真的有如坐春风的感觉。表兄很注重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不用说，他的学生大多都是写作能力比较强的。表兄还兼任了攸县电大的老师。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因攸县人事局不同意，他因此而没做成湘潭师范学院中文系或国防科技大学（大一语文）的老师。不知道表兄至今对此还耿耿于怀否？

表兄自称杂家，谦虚的意思显而易见。我也曾说他是杂家，但这个“杂”

取“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杂”的意义。这部73万字的文集，其文体之完备，题材之多样，语言之老到，艺术方法之讲究，是我辈无能望其项背的。这部文集里，有传记，有散文，有诗歌、诗论，有戏剧，有说唱，有序跋，有传奇故事，有文史文献，还有日记……所写的人物有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有蜚声国内外的佛学泰斗、有国宝级的大学教授，有民间传说中的人物，有谜一样的慈善家，也有不同时代的小人物……

我现在随意向读者诸君介绍《陈浩望文集》中的篇什：读了《欢乐和悲伤都化作歌唱》，你一定会被红色流放犯唐有章的西伯利亚艰苦流放生活和他与五个善良女性的悲欢离合感动得潸然泪下；读了《引起胡耀邦关心的旧案……》，你可以惊奇地知悉旧社会一桩黄金抢劫案秘史，从而对旧社会的黑暗有进一步的认识；读了《炎帝陵纪行》，一定会对炎帝陵格外向往（如果你还没有去过炎帝陵）；读了新诗《故乡的苍松》、旧体诗《悼烈士谭龙》和《一桩牵延四十八年的毛泽东诗词公案》，你可以获悉陈浩望原来是写诗和诗话的一把好手；读了《麻风女邱丽玉》，你可以更知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文学，有着多多的精华可以让我们吸取；读了《列入北京大学研究课题的著作权官司》，读者会为表兄赢了那场著作权官司而欣慰。同时，也会学到有关著作权的难得一闻的法理解释……

我还要对表兄的长篇人物传记《佛学泰斗陈健民》和故事新编《古今孝子佳话》作些介绍。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的近30万字的《佛学泰斗陈健民》1988年初版，2010年再版，并由台湾水星文化出版社更名为《罕见的现代苦行僧陈健民》在2001年出版。这部作品以翔实的资料，洗练的文字，恰到好处地引用大师的诗作，把这位“罕见的现代苦行僧”写得格外的鲜活。这部作品最起码的贡献是让海峡两岸的佛学界和佛教徒熟悉了蜚声海内外的最权威的西藏密宗大师陈健民先生。

在《佛学泰斗陈健民》第一节《一位罕见的现代苦行僧被发现》里写道：

1962年，英国“西方佛教教团之友”的主持人香格罗吉多长者有一次游方参访印度，他在西孟加拉发现了一位已经闭关苦修二十余年的佛教徒。香格罗吉多长者参访过他之后，大为惊奇和钦佩。因为这位修行者不只具有过人的修行毅力，而且对佛教理论的通透也绝非一般修行者所能比拟。虽然他的修行法门以西藏密宗为主，但对禅宗、净土宗、华严宗等派的理论也甚为熟谙。还有一件让人佩服的是，这位没有受过什么高等教育的修行者，居然也凭自修而能够用英文撰

写佛教文章。

倾谈之后，香格罗吉多长者决定把这位修行者的经验及思想介绍给西方世界。于是他伙同 R. B. Kantipalo 先生开始定期作录音访问……1967 年，一部洋洋大观的英文佛教著述终于出现。这部书的名称是《佛教禅定》。

这部《佛教禅定》到底在佛学界有着怎样的地位呢？作者又引用了权威的资料：

港台著名学者蓝吉富教授撰文指出：

《佛教禅定》这部书是现代东方人对佛教修行方法的总整理。对佛教的各种修法，尤其是对密宗，从来没有人做过如此深入的体系性著述。这是继日本铃木大拙的英文禅宗著作之后，又一部出自东方人之手的划时代英文佛学著作。

这些引用的资料是最权威的，最有说服力的。为了写好这部传记，作者是通读了大师的全部著作的，不然就不可能做到恰到好处地引用，请看作者是如何写陈建民修行的艰辛的：

定居美国后，健民已年近花甲。这时他更感到时间的宝贵，为了警惕光阴白流，事业心松弛，他常常把手表开快。他在《开快手表》一诗中写道：

倪不时髦已脱群，修能至少矢精勤。

老来唯恐成衰退，钟表早开二十分。

这部作品文字极为洗练，这样的例子到处可见。请看：

健民在关房的日常功课是闭关禅定，静修密宗无上瑜伽功，对其他各宗也加以研习，并且每天安排时间释经著述，忘了自己，忘了他人，忘了一切。买菜请附近小童帮忙，先生把竹篮从窗口吊下去，童子买好菜，放在篮里，摆动绳子，报知先生，先生再把篮子拉上去。苦修精进，连新年到了也未觉察，当关房的一位小姑娘嘲笑先生，问先生是否知道新年已到的时候，先生以诗作答：

独处轻安绝俗缘，朝朝快乐是新年。

未知何日逢除岁，且与详谈压岁钱。

就是这两百余字的篇幅，就使这位以静修为乐的苦行僧的形象鲜活了起来。

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先后印刷两次的《古今孝子佳话》是浩望先生改写

古代二十四孝故事并加上现代孝子故事合并成书的。旨在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根据原作改写实际上是艰辛不过的再创作，我也曾经尝试过，但不成功。下面我想用几百字的篇幅，说说他《古今孝子佳话》中的古代孝亲故事。

其一，并非简单地将《二十四孝》翻译成现代白话文，而是参阅不少历史文献，进行加工和再创造。作者参考的文献有《二十四孝》、《二十四孝图》、《敦煌变文·孝子传》、旧《辞海》有关条目、《搜神记》、《中国名人词典》、《太平御览》等。要把这些文献读完是要花去不少时日的，而要综合这些典籍，并把它们改造成篇，没有扎实的功夫和功底是断断不可的。

其二，用亦雅亦俗的语言，将一个个感动天地的孝亲故事娓娓道来，颇有安徒生童话的味道。浩望先生的这部作品想象丰富合理，故事情节曲折生动，语言亦雅亦俗，最能体现他故事创作的艺术。

其三，处理糟粕不留痕迹。古代二十四孝故事，精华与糟粕并存。如果把存在明显问题的故事予以删除，那就显得卷帙不完整了。浩望先生是处理糟粕的高手。例如他将《郭巨埋儿》改为《郭巨送儿》。（我真不理解郭居敬等人为什么不知道改？竟然把这样一个恐怖的叫人心惊肉跳的故事传了下来。古人篡改历史不乏其例，他们为什么不把这故事做点改动？但这样也好，他们把这“改”的好机会留给了浩望先生。）这一改，改出了新境界，改出了人性的善！这篇故事经过作者这一改，并加上作者丰富合理的想象，成为了这部作品中最精彩的系列故事之一。

1995年，湖南省教育厅指定《古今孝子佳话》为湖南省各中小学图书馆的必藏图书。

《陈浩望文集》里，还有由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学术专著《民国诗话》（著名诗话学家蔡镇楚教授曾称《民国诗话》填补了中国诗话史的空白）的选文，还有作者在电大的讲义和发表在《东坡赤壁诗词》的颇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古典诗词四声辨》。

我们说浩望先生是一名学者型的作家未尝不可吧？

本文集的说唱类收录了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中的两个：《梁山伯与祝英台》和《孟姜女寻夫记》。陈先生对“梁祝”传说和“孟姜女本事”进行了细致的考证。犹以“孟姜女本事考”最为有价值。该本事考文字如下：

《孟姜女寻夫》除了歌颂孟姜女对爱情的忠贞不二之外，更为突出的是反映

了人民反暴政、反徭役的强烈感情。这种感情是被压迫、被奴役的劳苦大众从社会实践中形成和积蓄起来的。在这种形成和积蓄的过程中，产生并发展了《孟姜女寻夫》的故事。然而，从整个历史记载来看，真正形成《孟姜女寻夫》原型的标志，应是见诸抄本《碣玉集》中转录的《同贤记》：“杞良，秦始皇时北筑长城，避苦逃走，因入孟超后园树上。超女仲姿浴于池中，仰见杞良而唤之：‘君是何人？因何在此？’对曰：‘吾姓杞名良，燕人也。从役筑长城，不堪辛苦，遂逃于此。’仲姿曰：‘请为君妾。’良曰：‘娘子生于长者，处于深宫，容貌艳丽，焉为役人之匹。’姿仲曰：‘女人之体，不得再见丈夫，君勿辞也。’遂告以父，父许之。夫妇礼毕，良往所作，主典官怒其逃走，打杀之，尸筑城内。超不知良死，遣仆欲往代之。闻良已死，筑城中。仲姿既知，悲哽而往，向城而哭，城崩倒。死人白骨交横，莫知孰是。仲姿乃刺指血，以血滴骨云：‘若是杞良骨者，血可流入。’即沥血，果至良骸，血径流入。负之归葬。”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并已具相当规模的记录。很显然，在这个故事中，孟仲姿（孟姜女）同杞良的爱情线索已经形成，并被置于突出的位置；同时，由于杞良因逃筑城之役，被杀害埋于城下的情节，也使故事的底蕴同人民大众反暴政、反徭役的强烈感情相沟通。正是这种人物、情节、感情的统一，构成了《孟姜女》传说最初的生命机制。

表兄对“梁祝”和“孟姜”的考辨，证明了历史和民间传说的紧密关系。象春天的花朵，秋天的虫鸣那样，它们是历史的自然表现。表兄对民间传说和歌谣的采集研究，似乎告诉我们，那些灿烂开放在阳光下的野花实在是值得我们去培植的。

鲁迅曾经为我们记述了近代江浙一带民间流行的故事、传说，如白蛇娘子、美女蛇、猫狗相仇及老鼠娶亲等。这些具有一定文化史和民族心理学价值的故事，大都是鲁迅童年从长妈妈和祖母等人口里听来的，它不但成为他后来关于民间文艺理论的有力例证，也成为一般社会、文化批评的思想素材。到日本留学之后，他如饥似渴地寻找世界的知识食粮，在所购备的书籍里，就有《希腊神话》和《北欧神话》等，虽然没有文献正式证明，但是根据各种情况推测，他也必然接触到《伊索寓言》和《天方夜谭》这类当时国内外流行的启蒙的语学书籍——同时也是世界的民间文学名著。在日本留学后期，鲁迅写作了《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及《科学史教篇》等重要论文，在里面，他谈论到中国和外

国的神话、传说，并且显示出精拔的或确当的见解。

鲁迅对民间文学是如此的重视，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是如此的广泛和深刻，可见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有它不可忽视的独特地位。我们也许可以由此及彼，推及浩望先生对“梁祝”、“孟姜”研究的学术价值份量之重。

表哥的文学创作和理论研究获得了丰收。然而，他没有影响过组织上交给的本职工作。他在20年的教学生活中，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认真教书育人，在教师缺少的情况下，曾经又当班主任，又教两班语文；后来任教导主任、副校长，也教两班语文；经常是超负荷工作，挑灯夜战至黎明是常有的事情。1977年恢复高考到1983年的7年中，他一直执教高三语文，教学得法，成绩斐然。表兄在1984年，被调出教育系统，两次任攸县文化局副局长，主管业务工作。一般来说，在局机关工作应该清闲许多，然而，他并不清闲，经常下乡抓乡文化站建设工作，而且，抓得有声有色。任职期间，渌田镇、柏树下乡、坪阳庙乡等乡镇的文化站被评为株洲市先进文化站，鸾山乡文化站荣膺全国先进文化站称号。《人民日报》曾以《罗霄山下文化乡》为题对此作了报导。表兄在任攸县电视台台长期间，撰写、拍摄的文艺片《丰子恺先生漫画欣赏》在湖南电视台播出后被中央电视台转播并获奖。教师归队后，表兄在攸县教育局任副局长，主管的教研、普教、电大、自考等工作均曾在株洲市列为先进。

表兄的本职工作，做得圆满成功，他的业余和退休后的创作也结出硕果，除了多部专著外，还有在大陆和港台报刊杂志发表的数百篇（首）诗文，总数达200万言。

对本职工作的兢兢业业，对文学创作的执着追求，使得陈浩望先生体力透支、华发早生，而表兄却始终不悔。我对表兄是肃然起敬的！

是为序。

2011年12月26日

自序

1953 年上期，在家乡读小学五年二期。语文老师尹国钧以《春天》为题布置作文；我恰当地引用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佳句。尹老师大为赞赏，张贴传观，语重心长地和我谈话：“新中国的青年应该树立远大的理想，我看你应该以当作家为理想。你认为怎样？”“愿听老师的话，以当作家为理想。”但能不能实现，哪里有底？当时只不过是梦幻而已。

1955 年下期，考入攸县二中。语文老师是谭鹤翬（他是大作家张天翼的学生）。谭老师也很欣赏我，常常介绍文学作品，嘱认真阅读。在谭老师的指导下，我阅读了许多中外名著，巴金的小说《家》、冰心的散文《寄小读者》、莎士比亚的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至今印象深刻；唐诗、宋词、元曲的一些篇什，至今能够背诵。谭老师给我的作文评语别具一格，如“胸中雪亮，腕下风生；未来作家，是耶，非耶？”这使我很激动。此时此刻，我坚定地树立了当作家的理想，决心圆成作家之梦。

我几乎用了所有的课余时间写稿；有时甚至在昏黄的路灯下写稿，并开始投稿，《萌芽》、《少年文艺》、《新苗》等刊物，都是我当时投稿的对象。稿子寄出后，几乎天天盼望回音，可是石沉海底般每次都没有回音。最初，投稿信的邮资打折，每封 3 分钱（信剪角），后来是全额贴邮票，几乎把有限的零用钱都用到投稿的邮票上了。有时实在买不起邮票寄稿，就求人、借钱。1957 年，报纸杂志批判作家丁玲的“一本书主义”、批判作家刘绍棠的“为三万元稿费而奋斗”。我却不以为然。心想：能写一本书有什么不好？写稿能赚到三万元，有什么不好？我如果有钱，也不至于投稿没有邮票向人借钱吧。

高中阶段的 1958 年下期，进行教育革命，学生下乡参加“土法炼钢”，在实践中读书。回校后，继续教育革命，主要是自编“语文乡土教材”。我写的歪诗《钢花颂》被学校油印作为“乡土教材”。老师在讲台上讲《钢花颂》，我和同学们一起听《钢花颂》。这时不由得想起刘绍棠。17 岁的刘绍棠上高中时，他写的短篇小说《青枝绿叶》早已被选入当时的高中语文课本。刘绍棠是自己听老师讲解自己写的作品。我现在也是上高中，也是听老师讲自己写的作品。两者

多么相似！俨然觉得自己就是作家刘绍棠了。

高中快毕业时，回老家筹学费。听一位老农指着禾场上一棵高大的松树说：“毛主席当年率领队伍在这棵松树下停留过……”这是一个很好的创作素材。当晚，彻夜不眠，构思了一首歌颂毛泽东的叙事诗《故乡的苍松》。第二天起床后就记录，投寄《新湖南报》。我以为又是石沉海底，然而这回却是半个月后就收到了编辑部的退稿信，批语是：“建议再写”。我很兴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得到编辑部的回音，而且“建议再写”啊！本来马上就要动手修改《故乡的苍松》，但考虑到高考迫近，大意不得，改诗一事放了一放，抓紧时间复习功课。

1961年下期，我考入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取出从攸县带到长沙的退稿《故乡的苍松》进行修改，再寄《新湖南报》。不几天收到回信：“经研究，决定发表《故乡的苍松》。但还要修改才好……希改后再寄。”我请同班的高材生江灏帮助修改。江灏将《故乡的苍松》润色几番，终于发表在1962年2月18日的《新湖南报·激流副刊》（报影见本书第319页）。在省报发表近百行的长诗，非同小可。拿到散发着油墨芳香的样报，我和江灏都高兴极了。报社寄来20元稿费，这在当时是不小的数字。稿费润泽了拮据的口袋，对写作的积极性也不无鼓舞。我和江灏从此成了很好的朋友。可是我们少不更事，邀集几个长沙市的文学青年，办了一个油印《诗刊》。第一期卷首就是《故乡的苍松》。其余是各种题材的小诗。例如江灏的《枫叶》：“枫叶红了/秋也深了/摘一叶霜枫/能留得金秋多少/秋林的枫叶哟/你的颜色有如红豆……”印了几十本送给朋友们看。意料不到的是，此举几乎闯了大祸。一天，“现代文学”教师蔡健先生（攸县人）把我叫到他的家里，严肃地说：“最近我在省文联开会，看到了江灏和你办的《诗刊》，有关方面认为：你们的诗刊，以宣扬资产阶级爱情观为主，企图摆脱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已经立案，正在侦查。唉，你们这些青年呀，赶快把你们的《诗刊》停了吧！”我立即告诉江灏，江灏马上把《诗刊》停了。过了几天，蔡健老师又找我谈话：“你们很快就停了诗刊，有改正错误的表现，我呈请有关方面从爱护文学青年出发，手下留情。有关方面同意撤案。”这才松了一口气。（实际上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江灏考上湖南师大中文系研究生时，有关方面才退回全部材料，彻底结案）。过了几天，蔡健老师第三次找我谈话：“我们师院中文系有很多优秀教师，有的是鼎鼎有名的教授。图书馆有数百万册图书，学习环境很好。建议你目前把写作放一放，积累知识，不愁将来没有发表作品的园地。”我唯唯以退。此后，自习时间我几乎全泡在图书馆里。

1965 年秋，我被分配在邵阳一中工作。一年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文字狱随时随处出现。“黑云压城城欲摧”，谁还敢写文章？联想起在长沙母校时的《诗刊》事件，不寒而栗。很长时间没有写文章，宝贵的时间白白流失了！

1973 年，调回故乡，在攸县二中工作。我决心用优异的教书育人成绩回报母校。1976 年 12 月，我在二中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攸县二中注重文体活动，节日自编自演节目成风。这是我大显身手的机会。这时的攸县文化馆注重文艺创作。该馆办了月刊《群众文艺》。我踊跃投稿，几乎每稿必中。如果说文革期是我创作的“冬眠”期，那么这时是从“冬眠”中“复苏”了。

1984 年元月，我被调任攸县文化局副局长。6 月，被任命为攸县第一届文联副主席。这时，我的文学创作从“复苏期”进入了“爆发期”。我写了上百篇（首）的诗文投寄报刊，连连发表。春节后，株洲市文化局一班人来到攸县峦山乡举办“创作学习班”，编印了《株洲演唱》，其中“文艺动态栏目”中的《不一般的学员》写道：“三十几个学员中，有几个引人注目的不一般的‘学员’。攸县文化局副局长陈浩望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今年正月初六才从学校到县文化局走马上任。十六日创作班开始时，尽管政务繁忙，还是以普通一员的身份，在鸾山饭店住下来了。短短的几天，他就改出了一个小演唱，写出了两首歌词。后来，局里事太多，他才恋恋不舍提前回县了。但还是带回一个题材，晚上在家里加班加点写作。当创作班结束，他在高兴地迎接归来的同志们时，又拿出了一个长达三百多行的演唱！”

1991 年旧历年底，一个意外的机遇使我的创作出现了又一高潮——被誉为“中国特级超人”的侯希贵回到他曾经工作过的攸县剧团过年。我受文化局的委托，负责接待侯先生。在和侯先生的频频接触中，我深感侯希贵是一个奇人，是一个极不平凡的人。尽几个半夜到黎明，写成三万多字的报告文学《中国特级超人侯希贵》，在 1992 年第二期的《洞庭湖》杂志作为“打头阵”的文章发表。万万料不到的是，人们看了《中国特级超人侯希贵》一文后，见仁见智，争议蜂起。有人认为，什么超人！侯希贵的“特异功能”不可信，骗人！这样的人不应该宣传。陈浩望偏要宣传，还不是为了弄几个钱，冷嘲热讽。面对非议和嘲笑，通过冷静考虑，我仍然确定：继续大力宣传侯希贵。因为持不同意见的人一叶障目，没有全面看侯希贵。侯希贵急公好义，大公无私，为湖南省的公益、慈善事业捐款达 600 万元（这是 1992 年的数字。到二十世纪初，侯希贵的捐款已

超过一亿元，有口皆碑，连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受到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亲切接见。对于侯希贵的特异功能，现代科学至今没有定论。如今侯希贵先生仙逝，已成很遗憾的永久的谜）。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侯希贵急公好义、大公无私的精神是最闪光的东西，最值得宣传。至于“还不是为了几个钱”的抨击，我是这样想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伏案爬格子，辛勤笔耕，通过复杂的脑力劳动得几个稿费，何罪之有？只有那些不劳而获的贪官污吏才是要群起攻之的可耻的社会蛀虫！我继续大力宣传侯希贵，影响深远。1994年9月，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拙著《中华奇人侯希贵》一书，面向海内外公开发行。陈浩望这个名字更被媒体广泛知悉。我收到一封接一封的约稿信。过去投稿多是石沉海底、没有回音，现在却是约稿信纷至沓来。今非昔比。我借此东风，翻出陈年的材料积累，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写成文章向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投寄（当然，这时不再是写侯希贵，而是写其他方方面面值得一写的人物传记或其他文体的作品）大都得以发表。

闻一多有一句云：“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正当我埋头继续笔耕的时候，有一天，接到《雪峰》杂志主编、攸县籍的杨容芳先生的信（我向《雪峰》投过稿，赠过书给杨先生）。杨容芳在信中说，他看了我写的几本书和散见在各地报刊杂志的文章，认为我够条件加入湖南省作家协会了，他嘱我向株洲市文联申请，请株洲市文联向省作协推荐。我蓦然回首，回顾自己的创作历程：这些年来，我总共约有90余万文字在内地各种报刊发表，还在香港《大公报》、台湾《传记文学》发表过文章。广西民族出版社除出版了前述的《中华奇人侯希贵》以外，还出版了拙著《古今孝子佳话》、《民国诗话》。北京的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拙著《佛学泰斗陈健民》。以上四部书共104万字，加上在报刊先后发表的诗文累计已超过200万言。几十年的笔耕已经获得可观的收获。我向株洲市文联寄去了请求加入湖南省作家协会的申请，市文联向省作协推荐，我终于被接收为湖南省作家协会的会员，圆成了作家之梦。时间是1998年12月。

收到省作协寄来的会员证和通讯录时，首先想到的便是尹国钧、谭鹤翥、蔡健三位师长。但这时三位师长都已作古。我默默地祈祷，祝他们的灵魂在天国幸福欢乐。

从1953年上小学时初入作家之梦，初中时继之，深入作家之梦，到1998年圆成作家之梦，前后经历45年。45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不过是短暂的一瞬，而在短暂的人生中却是漫长的岁月！漫长创作岁月中的曲折、艰难和辛苦，不是本

文所能完全道尽的。我想，多数搞过创作的人都能理解，都有同感。在45年追求作家之梦的过程中，虽说历经了许多的曲折、艰难和辛苦，但是我始终锲而不舍，以坚韧的毅力，顽强的意志，孜孜不倦地写作，作家之梦终于圆成。这是堪可告慰家人和自己，并无愧于社会的。

本书收录了儿孙的文章，其目的并不是希望或暗示儿孙们也以当作家为理想，成为作家；而是为了尊重他们的劳动，给他们一些鼓励。希望他们从前辈圆成作家之梦的艰辛中得到启示：无论做什么事，都应当脚踏实地，不屈不挠，顽强拼搏。这样才能有所成就，对社会有所贡献。当然，在现在这样的升平盛世，我的儿孙们如果能

比我多几个文艺细胞，不象我这样要漫长的岁月才能成为作家，那么他们以当作家为理想，追求成功，为精神文明作贡献，推动物质文明，我也不那么反对。

我已在教育战线退休十余年，年已七十三岁，垂垂老矣。幸耳尚聪，目尚明，思维尚敏捷。我要抖擞起精神，发挥余热，再拿起笔来，写些诗文，为新时代的文学艺术再作贡献！

陈浩望

2011年12月26日



陈浩望的作家证



报道陈浩望任攸县
第一届文联副主席的株
洲《文联通讯》